

生态视境下的陶渊明及其诗歌

段幼平

(湖南学院 中文系, 湖南 郴州 423000)

[摘要] 生态学认为,人与万物同是自然生态的一部分,具有同源性,人与自然生态不可分离。因此,陶渊明的田园回归就是人性与山水自然在生态上的本质呼应,而他的家乡浔阳柴桑则为他回归真性提供了一种可能,使他产生了返朴归真的生态心理,达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同时,陶渊明所开创的委运顺化的“新自然”人生观形成了他生命的稳态,多维的生态位也使他的生活充满诗意和情韵。

[关键词] 生态学; 本质呼应; 自然; 陶渊明; 稳态; 多维生态位

[中图分类号] I207.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712(2012)01-0039-04

生态学认为人本身就是一种生态存在,是“有生命的自然存在物”。当我们用生态学来观照一位作家的创作时,他生存的自然环境、社会环境、文化时空环境以及他的自身内部环境就会构成一个具有共同生成机制的生态环境。因此,在生态视境下我们重新审视陶渊明,将会摆脱以往单一从文化诗学的角度来把握作家、作品的陈旧模式,而是将视野拓展到具有“生态视野”的大文化的研究上,这无疑会给我们的研究带新的发现。

一 人和自然具有同源性,人和自然生态不可分离

生态学认为,人在整个生态价值体系中,既是客体,又是主体。一方面,人作为生态系统亿万生态分子中的一个,必须遵循大生态系统生存衍变发展的规律,与其他生态因子发生千丝万缕的联系,不具有特殊性;另一方面,人具有自觉性、能动性。由于人类的参与,整个地球生态系统得以调节、变化,构成了更为复杂的自然生态、社会政治生态、文化思潮生态体系,从而形成了特定的生态秩序和生态圈,促进了整个生态系统的循环发展。

在中国古典哲学和文学著作中,通常是用“自然”一词来表达对“生态”意义的理解。“自然”一词最早见于《老子》:“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1]在这里,“地”包括地球上的一切生态结构及其环境。在老子看来,人处天地之间,存于大地之上,是“地”的一部分,因此人效法于地;而地之上的生物出生、成长、死去,是一种自然生存状态,这就是“道”的体现,所以最终人、地、天都要效法于“道”,“道”法于自然。老子“天人合一”的观点,拉近了人与自然,与道的关系。这种观点同样在《庄子》中有所体现“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2]庄子认为天、人之

所以可以相和,就在于“道通为一”,即人的生命存在与天地的自然存在相合为一。老庄思想充分揭示出人与万物同是自然产物,具有同源性的本质,人与自然生态不可分离。

山水自然与人性在生态上的本质呼应,让作为审美主体的人对自然有同根同源的一致性和亲近性,因此从生态视境下观照山水和诗人,我们发现诗人有了山水的自然性,山水有了诗性的美。庄子叹曰“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其中的“美”就是天地的生态自然性。人,游于天地之间,对山水自然的审美态度不是凌驾于天地之上的俯视,而是身处其中感受生态的平视。这种共通共融的审美感受使人和万物有相同的生态节律,并从社会道德约束中解脱出来,消除了人与自然万物的排异性,与山水生态进行本质的情感交流,人的精神世界也达到极大的充盈和满足,这就是庄子所说的“逍遥游”。因此,庄子与惠子同游濠梁之上,他不但能知鱼之乐还能自乐,庄子在和谐的物我交融中体会到了审美的愉悦,正所谓“山林与,泉壤与,使我欣然而乐焉”。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人对山水自然的依赖、亲近和以此产生的“大美”审美感受更多是来自生物相互之间的本质相融和呼应,是生命个体在整个生态体系中的本体需要,这是无功利性的自由的心理,这就是“自然”。

东晋诗人陶渊明在官场挣扎 13 载后的田园回归就是一种生态本质上的需要和渴望,而不是所谓的悯晋祚之秋或是文人官场失意的心理沮丧。陶渊明在《归去来兮辞》序中谈及辞官归隐的原因时说“及少日,眷然有归欤之情。何则?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这里所说的“性”,就是作为生态个体的“本性”,即如同吃饭、睡觉一样维持个体生命生存的一种自然之性。陶渊明所生活的晋宋时期是

[收稿日期] 2011-12-21.

[基金项目] 湖南省教育厅资助项目(10C1218).

[作者简介] 段幼平(1971—),女,山西太原人,湘南学院中文系副教授,硕士,研究方向:先秦至唐代文学。

一个“真风告逝，大伪斯兴，闾阎懈廉退之节，市朝驱易进之心”的乱世，恶劣的政治生态环境使得陶渊明无法秉持自然本性立足于官场。生态学认为，在面对“环境变异”，生态个体不能在剧烈变动的环境中运行时，就会采取有效的行动来限制内环境的变异而寻求生存的相对稳定性。《宋书》记载陶渊明“不堪吏职，少日自解归”^[3]，陶渊明在《与子俨等疏》中说自己“性刚才拙，与物多忤”。“不堪吏职”、“与物多忤”都表明了陶渊明“性刚”的自然本性与当时社会生态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只有返归田园山林，生命个体的生态本性才能得以完整真实的体现，才能与大化同流，从而实现对生命的超越。所以，“惟有陶渊明，不自觉地、自然而然地找到了‘生存方式’与‘人格理想’的契合之处：归隐南山，从而将生存方式与人格理想统一起来”^[4]。这使得他的人生目的没有政治的功利性而显得单纯，这也使他诗中的万物都保持生物原本的面目，以自然呈现的真性打动人心，正如海德格尔所说“接近故乡就是接近万乐之源（接近极乐）。故乡最玄奥，最美丽之处恰恰在于这种对本源的接近，决非其他。所以，唯有在故乡才可亲近本源，这乃是命中注定的。”^[5]

二 陶渊明的田园回归是人性与山水自然在生态上的本质呼应

陶渊明对田园的选择是因为山林田园与他本性有生态同源的本质呼应，同时城市生态环境也没有为他提供可以安身立命、灵魂止泊的条件。与广阔、质朴呈开放性的田园山林相比，城市生态环境更多地体现出狭隘的人为痕迹，于是许多士人在沉浸文明进化带来喜悦的同时也感受到了纯真生命本性迷失的痛苦。对此，那些不舍仕宦同时又渴望获得精神自由的士人采取了一种折中的方式——大兴园林。从外在形态看，园林中有山、有水、有楼、有亭、有花、有树，同时可行、可望、可游、可居，人在园林中，可以畅叙幽情，把酒言欢，吟诗作赋，谈玄论道，寄托情怀，“园林既是士人居住的物态家园，同时也是士人的精神家园”^[6]。但同外放型的自然山林生态体系相比，园林生态呈现出内敛性、人工性的特征，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是城市生活生态的异化，是士人一相情愿地用人为方式创造出来的“城市山林化”范本。

陶渊明是魏晋之时对“自然”实质把握最准确之人，受当时道、玄思想的影响，他一方面追求精神灵魂的自然存在，另一方面需要在广阔、纯真的自然山水生态环境中去保全这种自然存在。浔阳柴桑则为他脱离官场，摆脱“俗韵”，回归真性提供了一种可能。浔阳郡生态环境优越，濒江扼湖，山水得天独厚。北临长江，江水浩浩汤汤，气势非凡；南屏庐山，层峦叠嶂，悬泉银瀑，佳境美景，奇诡瑰丽；东滨烟波浩淼的鄱阳湖，湖光山色，归帆渔歌，美不胜收；南望幕阜，山川秀丽，碧翠环绕。浔阳四季分明，光照充足，雨量充沛，气候温暖。生态学认为，当光照、温度、水、土壤、大气等生态因子处

在最适范围时，就能为生存此间的生物提供良好的栖息地，从而使生物对其中的各项生态因子都有较大程度的适应，耐受性也会相应扩大，生命强度也会相应提升。和谐的外部生态环境可以给人带来舒适的心理感受，在这里没有名教和自然冲突带来的烦恼，没有残酷政治斗争下生命朝不保夕的恐惧和焦虑，有的是束缚解除后的轻松和释然。山水自然的亲切宁静，人与万物的和谐交融都使人的心理倍感稳定和安全。尤其在竞尚玄远的东晋，诗人面对山水生态更能体认到“自然山水本身即最能表现造化之功与自然的真象，目击耳闻山水的自然显现，可以领悟万物同枯荣，鹏鸪无差别之理，可以破除万象与象外的鸿沟，以至‘同体于自然’，与自然融而为一”^[7]。所以，陶渊明在诗中写道“静念园林好，人间良可辞”（《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归园田居》其一）。他是独立自由的个体，他返回了那没有异化的精神世界，他感受到了身后那自然温馨而神秘怀抱的巨大魅力。

山水田园与陶渊明产生的自然生态同源呼应使得他产生了愉悦、平静、与物冥一的心理和精神感受，这在他的诗歌中集中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人与自然生态和谐为一

在陶渊明的笔下，故乡的生态环境和谐美好，人处其中能忘却世俗功利“天气澄和，风物闲美”（《游斜川》），“日暮天无云，春风微扇和”（《拟古九首》），“和泽周三春，清凉素秋节”（《和郭主簿》），“风雪送馀运，无妨时已和。梅柳夹门植，一条有佳花”（《腊日》）。春天正是万物复苏，欣欣向荣的时节，草木因风和日丽而抽丝吐翠，花朵因雨水丰润而含苞待放，而且“鸟啜欢新节，冷风送馀善”，大自然生态圈中的空气、雨水、阳光、土壤等生态因子相互作用，彼此关联，处在最佳的状态，万物顺应相同的生态节拍繁衍、生长。诗人感受到了与树木、花草相同的生命律动，沐浴天地之“和气”，“冀缺携俚，沮溺结耦”（《劝农》），寄身于宇宙之间，与大道俯仰，在辛勤的耕作中体悟人生真谛，反观自我的本质，因此，虽然“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却在“欢言酌春酒，摘我园中蔬”的平凡生活中感受到了天、地、人的和谐和欢愉，所以他说“五六月中，北窗下卧，遇凉风暂至，自谓是羲皇上人”（《与子俨等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饮酒》五）。大自然并不会因为有了人类的主观活动，就受制于人类，它仍依照不可更改的自然规律运行着，她有自己的独立性。人类只有尊重“大钧无私力，万理自森著”的自然规律，将自我放置于广阔的自然宇宙之中，才可以体会到“大钧”化育生命的奥秘玄趣和万物同源一体的永恒和谐，可以在日暮岚气、归林鸟儿那体悟到夕阳西下，人返家园的情感共鸣，才会保有生命的灵性和灵魂的安顿，才会物我冥一。

（二）人与人和谐相融

生态学认为，在自然生态体系中，物种不是以个体分散

的形式存在,而是以不同数量的个体集合在一起,这就是集群。集群是生物适应环境的一种重要特性,良好的生态环境(生境)可以使共享这一空间的生态个体的关系更为紧密和稳定,从而彼此联系,相互影响,构成良性的生态循环体系。人作为生态圈中的一分子,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实际上也是为适应生存环境的一种本能需要。浔阳优越的自然生态环境以及相对稳定的经济生活条件,为生活在这的人提供了良好的栖息之所,再加之,浔阳一带是当时思想文化的中心之一,儒、释、道、玄文化常常呈现出相融互摄的关系。例如,高僧慧远在庐山设坛讲法,四方云聚,千里遥集;豫章太守范宁“儒博通综,在郡立乡校,教授恒数百人”^[8]。浓厚的思想文化氛围使得陶渊明的隐居生活适意会心,同时也优化了他的心理环境,形成其胸次高旷、纤徐从容的风度和平和亲切、不拘小节的为人之道。钟秀曾说“陶公所以异于晋人者,全在有人我一体之量。”^[9]他的生活充满了人伦之情,亲朋之乐“有客赏我趣,每每顾林园,谈谐无俗调,所说圣人篇”(五言《答庞参军》)，“不有同好，云胡以亲”(四言《答庞参军》)。陶渊明与朋友的“同好”就是对大自然的热爱,对本性真纯的无限渴望和追求,这是他与朋友心灵契合的基础,因此,他们可以“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移居》)。在《归园田居》五首中,陶渊明还描绘了他与邻居的和睦关系“漉我新熟酒,只鸡招近局。日入室中暗,荆薪代明烛。欢来苦夕短,已复至天旭”,“时复墟里人,披草共来往。想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陶渊明和农人的情感淳朴而真实,他们的悲喜随着气候对庄稼的影响而起伏波动,交谈中蕴涵着熟悉亲切的交流和毫不露声色的友谊,陶渊明与他们没有阶级、地位的区别,只有作为生命个体相同的平等和尊严。

三 陶渊明委运顺化的“新自然”人生观和多维生态位形成了他的生命稳态

陶渊明的返归田园遵从的是内心对自然本性的需要,但这并不意味着保全了自然质性就一定伴随着精神的欢欣。归隐生活让陶渊明逐步陷入了衣食不继的窘境。“箠瓢屡罄,絺绤冬陈”(《自祭文》),有时他也会感到冷寂,“欲言无予和,挥杯劝孤影”(《杂诗》其二),有时也会感慨“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但他决不苟求富贵,不“戚戚于贫贱”,不用牺牲真性去换取显达、名望,大多数情况下,他都会在寄傲南窗、壶酒自酌、抚琴赋诗、登皋舒啸、躬耕南亩中获得生活乐趣。同样拒绝随波逐流的屈原,坚守自己的政治理想和高洁人格,却一次次陷入精神困境,无法化解理想和现实、兼济和独善的冲突,苦闷而彷徨。屈原是通过选择死来实现对生命的超越的,他的死体现了儒家人生哲学观为士人所规范的生命存在范式的一种困境,即“儒家人生哲学对于社会政治功利的推崇,又无法为这条退路提供足够的依据”^[10]。嵇康试图将庄子主张的物我两忘,身为枯木,心如死灰的纯哲学境界变为一种实有的人生境界。

但刚直峻急性格的他“越名教而任自然”,在思想感情上把自己和世俗对立起来,最终遭致杀身之祸。嵇康的悲剧说明,把人性从礼法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追求个性自由的同时脱离现实是不行的。阮籍不把自己处于名教的对立面,他的一生始终徘徊于高洁与世俗之间,依违于政局内外,虽得以善终,但一生孤独、苦闷。阮籍的悲剧在于,他既有一个庄子逍遥游式的人生境界,但在内心却存在着比一般礼法之士更为标准的儒家道德规范,因此,他始终处于矛盾心理挣扎中。

生态学认为当生物个体在面对环境变异时,不得不采取有效的行动,才能限制内环境的变异,维护其恒定,这就是生物机体的生态内调节。生态内调节有助于形成生物生存相对恒定的内部环境,即稳态,从而利于生物生存。稳态是通过生理机制或行为对策来实现的。屈原、嵇康、阮籍的悲剧说明在面对环境变异时,他们的行为对策并未形成他们的生命稳态。同样面对纷繁乱世、宇宙无限、人寿不永的现实,陶渊明却始终独树一帜,坚守精神的稳态,唱出积极的人生高歌,就是因为他能集合儒、道、玄、释等家的精华,形成了委运顺化的“新自然”人生观,实现了对生命的超越。儒家中及时进德修业的思想、安贫乐道的生活态度,他都兼收并蓄;摈弃了道家一些不近人情的极端形式,使生活充满人伦之情;佛家般若思想也帮助他消除世俗的烦恼。由此可见,陶渊明的“新自然”观是在魏晋多元化文化大交融、多种思潮大碰撞下,整合了各种思想之精华,扬弃了各家之局限的产物,是他面对环境变异所采取的有效行为对策。在当时的政治文化生态环境中,他能充分利用身边的生态环境条件,调和生命状态,达到相对的内心中和、精神充盈,消除了现实生活中的怀疑和焦虑,形成个体生命的稳态,开辟了一条在传统主流之外的新的生活道路。

生态学认为每个生命个体都有一个“生态位”。“生态位”指的是生命有机体在自然生态系统中,在时间空间上所占据的位置及其与相关种群之间的功能关系与作用。生态位是一个物种所处的环境以及其本身生活习性的总称。随着生命个体的生长,它的生态位也会随之改变,有时生态位并不是唯一的。“影响有机体的每个条件和有机体能够利用的每个资源都可以被认为是一个轴或维。在此轴或维上,可以定义有机体将出现的一个范围。同时考虑一系列这样的维,就可以得到有机体生态位的一个增强的定义图。”^[11]因此,我们不难理解,陶渊明之所以受到历代文人的倾心推崇,就在于他以他的生活方式、生活态度、生活境界,展示了生命个体对世俗生活进行了诗意改造,多维的生态位创造出了令人追慕的理想人格和生存范式。

陶渊明是隐士,但与那些远离人间烟火、托身深山岩穴、拘泥隐逸形式的隐者不同,他结庐人境,躬耕自资,具有人情味,更具人性化。他追求“真”,遵从真性,透显真情,不拘小节,唯重大端;他崇尚“远”,远离喧嚣的“世情”,与

自然融为一体;他主张“简”,言辞简约,为人率性随和,不求繁缛礼节,因此,陶渊明的隐逸品格是高于一般隐士的,他的隐逸生活也更贴近自然。

陶渊明是一位思想家,他以简单的方式活着,但活得并不简单。他对生命、社会、宇宙都做了深刻的哲学思考。袁行霈认为“陶渊明不仅是诗人,也是哲人,具有深刻的哲学思考,这使他卓然于其他一般诗人之上。”^[12] 陈寅恪先生干脆视之为“吾国中古时代之思想家”。陶渊明所建构的委运顺化的“新自然观”,既打破了旧自然观之说形骸物质之累,又对儒家名教立善扬名有所超越,这使得他在名利观、劳动观、生死观、社会观上较之前人有所突破。

陶渊明还是诗人,他是中国诗歌史上大量创作田园诗的第一人,田园从此在诗歌中具有独立的审美价值。他的田园诗乍一看极其普通,写的都是农村普通之景,用的也是难登大雅之堂的田家语,与当时繁缛、绮丽诗歌创作主流相距甚远,但“自然”的语言之下往往隐含着深刻的人生感悟,难怪元代李公焕说“余尝评陶公诗,造语平淡而寓言深远,外若枯槁,中实敷腴,真诗人之冠冕也。”^[13] 同时,陶渊明在诗文中并不墨守成规,而是对各种传统的诗歌形式进行改造、创新。他的四言诗不沿袭诗三百首的旧调,而是抒写新鲜活泼的内容;对于五言咏怀组诗,陶渊明的《饮酒》、《拟古》、《杂诗》、《归园田居》、《咏贫士》都能“吸取前人各家咏怀诗的多种表现手法,或借咏史述怀,或以比兴明志,尤其是那些描绘恬静纯朴的田园生活的作品,比兴形象与自然景物及抒情主人公的心境融为一体,已突破了一般咏怀诗的传统表现方式”^[14]。胡适曾说“陶潜的诗在六朝文学史上可算得一大革命。他把建安以后的一切辞赋化、骈偶、古典化的恶习都扫得干干净净。”^[15]

陶渊明的多维生态位让他成为一个精神世界充盈的

人,也使他的田园生活进入了玄澹高雅的境界,于是他看似凡俗的生活变得诗意化、情韵化了。

陶渊明的生存范式之所以独步千古,受人膜拜,就在于他自始至终将自己放置于生态体系中进行考量,处处体现出普通生命个体的生态自然性,实现着自我与山水生态的本质呼应,并从人生思想、生活方式、文学创作中呈现了生命本真的、原始的状态,这恰恰是魏晋之人所标榜又实则丢弃的宝贵本性。面对纷乱的世道,出处的艰难选择,陶渊明的多维生态位使他的日常生活带有深层的审美性,实现了精神生态和田园山水生态的良性互动。

参考文献:

- [1] 陈应鼓.老子今注今译[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169.
- [2] 王先谦,刘武.庄子集解 庄子集解内篇补正[M].北京:中华书局,1987:19.
- [3] 沈约.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 [4] 李建中.试论陶诗的人格精神[J].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7(6):76-82,101.
- [5] 海德格尔.人,诗意地安居[M].郗元宝,译.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04:87.
- [6] 余开亮.六朝园林美学[M].重庆:重庆出版社,2007:3.
- [7] 王国璠.中国山水诗研究[M].北京:中华书局,2007:109.
- [8] 房玄龄.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2360.
- [9] 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陶渊明资料汇编:上[M].北京:中华书局,1962:245.
- [10] 韦凤娟.悠然见南山:陶渊明与中国闲情[M].济南:济南出版社,2004:76.
- [11] A. 麦肯齐,等.生态学[M].孙儒泳,等译.北京:科学出版社,2000:19.
- [12] 袁行霈.陶渊明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2.
- [13] 李公焕.笺注陶渊明集[M].上海:上海书店,1989.
- [14] 葛晓音.八代诗史[M].北京:中华书局,2007:127.
- [15] 胡适.白话文学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80.

Tao Yuanming and His Poetry under Ecology Environment

DUAN You-ping

(Chinese Department, Xiangnan Institute, Chenzhou 423000, China)

Abstract: Ecology believes that human and nature is a part of natural ecology, with homology, human and natural ecology are inseparable. Therefore, Tao Yuanming pastoral regression is human nature and natural landscape in ecological essence echo. And his hometown, Xunyang Chaisang for his return trues provides a possibility, give him recover one's original simplicity ecological psychology to achieve harmony between human and nature, the harmony of person and person. Meanwhile, the "new nature" philosophy which Tao Yuanming created formed his life state, multi-dimensional niche had also made his life full of poetic flavour and charm.

Key words: ecology; essence echo; nature; Tao Yueming; state; multi-dimensional niche

(责任编辑:文中)